

论福克斯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苏婉心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摘要

物化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支配形式展开批判的核心命题。卢卡奇从劳动概念出发建构物化理论, 将物化批判由商品交换领域推进至生产领域。福克斯接续了这一批判路径, 将“脑力劳动”改造为“文化工作”, 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识别出技术物化与量化物化两种新型支配范式, 并试图通过“数字工会”与“数字公地”的方案实现对数字物化的扬弃。但福克斯的方案绕过了卢卡奇晚年始终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 即阶级意识如何从物化意识中生成。缺失对这一环节的说明, 任何克服物化的方案都缺少承载它的主体。物化批判需要从外在批判转向内在批判, 即在数字资本自身的运作逻辑中识别其无法被完全吸收的裂缝与剩余。算法黑箱与可解释性的张力、用户自主性与其被捕获的矛盾、不可数据化的残余, 三者构成了数字资本运作过程中无法根除的否定性要素。

关键词

福克斯, 卢卡奇, 物化, 数字资本主义

On Fox'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ukacs'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Theory

Wanxin Su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4, 2026

Abstract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s critique of social domination forms. Lukacs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objectific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labor, advancing the critique of objectification from the field of commodity exchange to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Fox continued this critical path by transforming "mental labor" into "cultural work", identifying two new dominant paradigms of technological object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object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文章引用: 苏婉心. 论福克斯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76-83.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61

capitalism, and attempting to achieve the abandonment of digital objectification through the schemes of “digital unions” and “digital commons”. But Fox’s plan bypassed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Lukacs had never been able to solve in his later years, which was how class consciousness was generated from objectified consciousness. Without explanation of this aspect, any solution to overcome objectification lacks the main body that carries it.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needs to shift from external criticism to internal criticism, that is, to identify the cracks and residues in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 that cannot be fully absorb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and interpretabili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ser autonomy and its capture, and the residue that cannot be digitized constitute the negative elements that cannot be eradicated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apital operation.

Keywords

Fox, Lukacs, Objectification, Digital Capit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物化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支配形式展开批判的核心论域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商品交换领域人与人的劳动关系如何为商品形式所遮蔽([1], p. 1), 卢卡奇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这一论题引入生产领域, 指出“可计算性原则”如何将工人排斥至生产过程的边缘位置, 使整个社会呈现为劳动者无法把握的“第二自然”([2], pp. 143-209)。经由卢卡奇的推进, 物化批判不再仅仅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存在, 同时获得了物化批判的理论品格。

当数字技术全面渗透至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诸领域, 物化批判遭遇一个新的理论难题: 数字资本主义是否滋生了超越既往形态的物化新形式? 马克思与卢卡奇奠定的批判框架是否仍具备解释效力? 围绕上述追问, 现有研究大致形成了三条主要的讨论进路。其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 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为代表, 直接承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框架, 将其运用于数字劳动与社交媒体批判分析([3], pp. 106-148)。其二, 哲学概念分析路径, 以蓝江、孙宗岭等学者为代表, 侧重于从物化批判的理论传统中提炼“智能物化”等新概念[4], 但对其在卢卡奇及福克斯谱系中的理论位置着墨较少。其三, 物化意识分析路径, 以周露平为代表, 侧重考察智能物化的物化意识性质[5], 亦未将其纳入卢卡奇与福克斯的理论关系之中进行系统审视。

在上述学者中, 福克斯的分析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于他是唯一直接从卢卡奇物化理论出发、并从中发展出系统性数字物化批判框架的学者。“技术物化”与“量化物化”这两个核心概念, 在理论上直接源于卢卡奇对“可计算性原则”的批判, 在分析效力上亦构成一个可容纳后续新现象的开放框架。因此, 考察福克斯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是理解当代物化批判如何回应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入口。

本文试图在卢卡奇与福克斯的理论接续与断裂之间, 回应一个总问题: 福克斯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 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不足? 在每一个层面的讨论中, 本文首先呈现卢卡奇的相关论述作为理论起点, 然后分析福克斯的继承与发展,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思考, 物化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当代发展。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物化批判对象的演变

讨论物化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发展，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物化所批判的“物”究竟是什么？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理论推进：他将马克思聚焦于商品交换领域的物化批判，扩展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部领域，并借助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在机器大工业的运行机制中揭示了物化现象的形成机理([2], p. 149)。卢卡奇的核心判断在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原则通过可计算性来调节生产过程，量化原则由此取代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在这一原则支配下，工人被排斥至生产过程的边缘位置，整个社会成为劳动者无法把握的“第二自然”([2], p. 157)。这种合理化不仅作用于劳动过程本身，亦深入工人的心理层面，使劳动活动丧失其主动性。劳动力与劳动者的人格由此分离，变成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卖的物。在卢卡奇的分析中，物化批判的对象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机器体系即死劳动的物质载体，从外部支配着活劳动；二是可计算性原则即量化的管理方式，将人的社会性特质甚至心理特性从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但卢卡奇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这些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卢卡奇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呈现为一种物的属性，因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和可计算性”([6], pp. 61-72)。这正是卢卡奇对马克思物化批判的真正继承——物化批判所要揭示的，始终是那种被物的形态所遮蔽的社会关系。

卢卡奇将物化批判的视域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并揭示了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批判能力的压制，此即其理论贡献所在。然而，这一框架亦遗留了两个未竟的问题。其一，卢卡奇试图以阶级意识的觉醒来扬弃物化，却未能回避一个深层困难，即在物化结构已渗透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条件下，这种意识缺乏从现实中自发生长的可能。它只能从外部被赋予，而无法从内部生成。阶级意识的觉醒因此缺少一条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其二，朱春艳与刘嘉琪曾指出，卢卡奇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物化的根源，而是直接由物化批判入手，这使得他的理论带有思辨色彩，未能有效说明物化意识何以产生、又何以可能被克服([6], pp. 61-72)。

正是这一理论缺口，将福克斯推至前台。福克斯意识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数字时代仍然有效，但需要以新的概念工具加以改造。他以“文化工作”取代“脑力劳动”，将物化批判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至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领域，由此开启了物化批判对象的第二次推进([7], p. 59)。福克斯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将物化批判的对象从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推进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和数据。

福克斯揭示了数字时代两种全新的物化支配范式，其一是技术物化，其二是量化物化。技术物化是数字时代对生产力本身的崇拜。由于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凌驾于人之上且能够支配人的力量，人们逐渐将数字技术视为自主的，即从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被孤立地考察；视为具有主观性的，即技术而非人成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行动主体。与此同时，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持高度乐观的态度。因此这些特征共同完成了数字技术的人格化与神秘化：技术发展被呈现为独立于人类意志与行动的过程，由此被物化为必然发生、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由此被转移到生产力内部，数字技术的发展似乎能够自行改善现存问题，不再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当这种观点获得普遍认同，技术物化就完成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功能。

量化物化是量化崇拜思维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福克斯指出，在数字时代，量化逻辑的作用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数据本身成为生产的原材料。数字技术只能处理数据，而无法直接识别人的特质，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以质的形式化、量化与数据化为基本前提。量不再是对质的排挤与统治，而是对质的表达。在这一逻辑下，只有能够被数据化的部分才获得承认，而不能被数据化的部分则被视作残余而遭到舍弃。量化物化由此将社会理解为由大量数据构成的事物，无视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

福克斯将物化批判的对象从具体可见的机器与商品，推进至抽象无形的数字技术与数据。崇拜的对

象不再是劳动产品，而是技术本身的力量与数据本身的客观性。然而，这一推进也留下了一个有待回应的问题：福克斯的分析框架主要建立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即以社交媒体、推荐算法和评分系统为核心分析对象。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当智能本身成为一种新的崇拜对象时，物化批判的对象是否需要再次扩展？

综合卢卡奇与福克斯的分析，并结合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物化批判的对象经历了三次扩展。

第一次扩展是从商品到机器的扩展。马克思的物化批判以商品交换为核心分析对象，旨在揭示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如何遮蔽了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关系([1], p. 1)。卢卡奇将这一批判推进至生产领域，指出在机器大工业中，可计算性原则从外部支配着劳动过程，工人被排斥至生产过程的边缘位置，社会成为劳动者无法把握的第二自然([2], p. 157)。这次扩展的实质在于，物化批判不再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进入了生产领域。

第二次扩展是从机器到数据的扩展。福克斯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引入数字资本主义语境，物化的对象遂从物质性的机器体系转变为抽象的数字技术与数据([3], pp. 106-148)。技术物化使人们将算法、平台、数字系统视为自主的、决定性的力量。量化物化则使人们接受自己被量化为数据点，相信数据具有客观性。这次扩展的实质在于，物化批判从物质生产领域进入了数字生产领域。

第三次扩展是从数据到智能的扩展。这是一次正在发生、尚未完成的扩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使物化的对象进一步升级，人们不再仅仅崇拜技术或数据，而是崇拜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身。蓝江将这一新形态概括为智能物化，指出它是商品物化、货币物化与资本物化在数字时代获得的最新形式([4], pp. 15-23)。周露平则进一步指出，智能物化是物态形式的崇拜机制，实质上仍是对物化社会关系的崇拜([5], pp. 41-50)。

与前两次扩展相比，第三次扩展具有两个特殊之处。其一，其遮蔽效应更强。对智能的崇拜比对技术的崇拜更为隐蔽，因为智能天然与人的创造力和主体性相关联，容易被误认为技术自身的属性，而非无数劳动者(包括数据标注员、算法工程师及用户本身)劳动的结晶。其二，它使物化批判的对象从生产领域扩展至认知领域，人们不仅在外在行为上依赖技术，更在内在认知上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判断。当代物化批判所面对的，是一个复合型的批判对象，即商品、机器、技术、数据与智能的多重叠加。每一种形态都以不同的方式遮蔽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卢卡奇面对的是工厂中的物化，福克斯面对的是平台上的物化，那么当代批判所面对的，则是渗透至认知层面的物化。这一变化为下一部分的讨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当物化的对象已从物质性的机器扩展到抽象的数据乃至智能时，其所实现的控制是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物化控制机制的深化

对于这一问题，卢卡奇与福克斯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卢卡奇以外部强制为核心范畴，揭示了工业资本主义中可计算性原则如何从外部支配劳动者，并塑造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2], pp. 143-209)。福克斯则揭示了数字物化的内在认同机制，即主体不是在被迫服从，而是在对技术的膜拜与对数据化逻辑的接受中主动配合控制([3], pp. 144-148)。两种框架的差异，反映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方式转变。当代数字物化的控制机制已从卢卡奇所述的外部强制与福克斯所述的内在认同，进一步深化为认知框架控制，其通过塑造思考的前提来完成。

卢卡奇对工业资本主义控制机制的分析包含两个层面：客观层面的外部强制与主观层面的物化意识。在客观层面，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通过可计算性原则实现对劳动者的外部控制。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各个局部环节，这种分解不仅作用于劳动对象，亦作用于劳动者本身。工人被纳入一个预先设定的机械系统，必须服从其运行规律，劳动力本身由此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出卖

的物。在主观层面，卢卡奇揭示了这种客观控制如何转化为物化意识。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体系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使整个社会获得了第二自然的特征。当一切社会关系均呈现出先天合理的形态时，主体便不再追问这种秩序的来历，而是将其接受为不可改变的法则。卢卡奇将这种现象理解为物化在意识层面的延伸([2], p. 157)。其控制机制可以概括为：外部强制塑造物化意识，物化意识巩固外部强制。劳动者不仅在客观上被排斥至生产过程的边缘位置，更在主观上丧失了批判性思维与总体性视野。在卢卡奇的分析中，被控制者虽然无力反抗，但其知道自己被剥削、被支配。这种觉知虽然被物化意识所压制，却仍然是阶级意识觉醒的潜在前提。

卢卡奇的局限性在于，他将控制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生产领域与阶级关系之中，未能预见控制如何扩展至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更未能预见控制如何从外部强制演变为内在认同。

福克斯在卢卡奇的基础上，揭示了数字物化控制机制的两个根本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外部到内在认同。主体不再将技术视为需要审视的工具，而是视为具有自身意志的自主力量。这种人格化使主体放弃了对技术的批判性追问，并在认知层面完成了对控制的接纳。与此同时，量化物化通过去质化生产实现了另一层面的控制。人的特质必须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才能获得承认。主体在接受自身被量化为数据点的同时，也接受了数据所代表的评价与排序，进而在欲望层面完成了对控制的配合。

福克斯揭示了数字物化控制机制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被迫服从，而是自愿配合。用户主动填写个人资料、授权定位、允许数据收集，因为他们将这些行为理解为享受服务的前提。劳动者主动加班、多接单、刷评分，因为他们将这些行为理解为获得更好机会的途径。这种自愿配合正是数字物化最为深刻的控制效果：被控制者不仅接受了控制，而且认同了控制逻辑，内化了控制标准，主动为控制提供条件([3], pp. 144-148)。

第二个转向是从生产领域到生活世界。卢卡奇的控制分析主要局限于生产领域，即工厂中的机器体系与劳动过程中的可计算性原则。福克斯则将控制分析扩展至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控制不再发生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而是渗透至社交、娱乐、消费等全部生活领域。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次点击与每一条评论，都在为平台生产数据；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每一次滑动，都在被算法学习与利用。控制不再有下班时间，主体只要连接网络、使用智能设备，便处于数字物化的控制之下。

综上，福克斯对卢卡奇的超越在两个层面上是成立的。其一，他将物化批判从生产领域推进至日常生活领域，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将人的社交、情感与消费等全部活动纳入资本的控制范围，这一点确为卢卡奇所未曾面对。其二，他指出数字物化的核心机制不是被迫服从而是自愿配合，这一判断准确捕捉了数字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控制特征。

但福克斯在某些问题上也误读了卢卡奇。卢卡奇虽然将克服物化的希望寄托于阶级意识，但他自己也承认，在物化结构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条件下，这种意识缺少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途径。它只能从外部被赋予，却无法从内部生成([2], pp. 143-209)。福克斯没有正视这一困境，而是直接跳过了意识如何形成的问题，试图通过“数字工会”和“数字公地”来组织反抗行动。这一跳跃预设了一个前提：劳动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被剥削者。然而，数字物化恰恰让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人们以为自己是“用户”“受益者”。

正是这一被忽略的问题，构成了福克斯方案最为根本的困难：如果数字物化已经深入主体欲望与认知层面，数字工会与数字公地是否仍能有效运作？在主体尚未自觉其被支配处境的情况下，组织化的反抗何以可能？福克斯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却未能充分预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变化。当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成为用户思考的出发点，算法推荐的排序成为用户判断的参照系时，控制已不再以强迫或说服为主要形式，而是通过预先塑造思考的前提条件来发挥效用。被控制者难以觉察自身的被支配处境，因为控制已经前置到了思考发生之前。这恰恰是福克斯框架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4. 数字物化批判的当代任务和可能路径

前两个问题的讨论表明，物化批判的对象已从商品与机器扩展至数据与智能，其控制机制亦从外部强制深化为内在认同乃至认知框架控制。当物化已渗透至主体的日常认知方式之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物化批判本身还能做什么？如果传统的批判路径已不足以回应数字物化的新形态，那么物化批判在当代的理论任务与可能出路应当如何理解？

对于这一问题，卢卡奇与福克斯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回答。本部分将依次考察这两种回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本判断：当代物化批判需要从外在批判转向内在批判，即在资本逻辑自身的矛盾中识别那些无法被物化完全吸收的剩余([8], pp. 52-56)。

卢卡奇对出路的回答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方法论层面的总体性辩证法与主体层面的阶级意识觉醒。

在方法论层面，卢卡奇主张恢复被物化意识所遮蔽的总体性视野。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 p. 1)。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总体性辩证法，即将社会理解为动态的、各部分相互关联的整体，而非孤立的、静止的碎片。总体性的辩证思维能够穿透物化造成的虚假表象，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扬弃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主体层面，卢卡奇将克服物化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他认为，物化意识是资产阶级用以巩固自身统治的思想工具，也是阻碍无产阶级事业的首要因素。朱春艳和刘嘉琪指出，卢卡奇没有坚守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物化的起源和发展，而是直接就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价值分析，因而未能使理论真正摆脱纯粹思辨的抽象性质”([6], pp. 61-72)。他未能为阶级意识的产生提供现实的生成路径。在高度物化的现实中，阶级意识是一种被赋予的意识，无法直接产生。此外，卢卡奇只是在理论内部探讨意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并未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实践这一构想，“哲学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与卢卡奇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方案不同，福克斯试图将批判从理论推向实践。他提出了以数字公地为核心目标的实践方案。

在福克斯看来，数字物化与数字异化只能通过社会发展加以克服，这些斗争的目的在于占有互联网并使其为用户所控制([3], pp. 342-346)。非异化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以共享、共创与共用为基本原则的公地社会之中，在这一社会中，人类控制着共同形成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体系及其结构与产品。因此，根本方向在于建设数字社会公地，通过消灭数字剥削来实现对数字物化的扬弃。

在具体路径上，福克斯提出了建构与解构并行的策略。一方面，数字无产阶级应当主动建构适合数字社会的公共空间，例如由用户与数字工作者自我管理的互联网平台，以及通过公共服务媒体网络创建的公共互联网平台。另一方面，这些平台的规模有限，难以对数字资本构成实质性挑战，因此必须同时开辟削弱私有平台社会影响力的道路，即通过数字罢工中断私有化数字平台的价值生产，逐步解构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范围。在组织力量上，福克斯寄希望于数字工会，即通过工会设计开发数字平台合作社，创造数字工人的聚集空间，并参与和组织劳工运动。

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形成条件的讨论，在此构成了对福克斯方案进行批判性审视的重要理论资源。卢卡奇虽然将克服物化的希望寄托于阶级意识的觉醒，但他未能回答的核心问题在于，阶级意识如何从物化意识中产生出来([2], pp. 143-209)。福克斯的数字工会与数字公地预设了劳动者能够认识自身处境并组织起来，却同样未能解释这一认识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启示在于指出了福克斯方案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主体觉醒的可能性问题。

卢卡奇与福克斯的批判路径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批判的立足点应当是一个外部的理想状态，对卢卡奇而言是总体性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对福克斯而言是数字公地。这种外在批判在今天遭遇的困难在于，数字物化已渗透至主体的认知框架之中，从外部输入一种正确意识或理想方案的做法，难以真正触及被物化所塑造的主体([8], pp. 52-56)。

这一困难并非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卢卡奇与福克斯各自方案中暴露出来的真实困境。卢卡奇承认，在高度物化的现实中，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缺少从物化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过渡环节([2], pp. 143-209)。福克斯试图绕过这一困难，他不再等待意识觉醒，而是直接组织数字工会与数字罢工。然而，福克斯的做法同样面临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当数字物化使主体将自身理解为用户与受益者时，在主体尚未自觉其被支配处境的情况下，组织化的反抗何以可能？两种方案的困境指向同一个方向：任何从外部输入正确答案的做法都无法穿透数字物化的认知控制。批判的立足点只能在物化内部寻找。

内在批判并非从外部设定标准来评判现实，而是从数字资本主义自身的运作逻辑中揭示其矛盾，在资本的自我运动中识别那些无法被物化完全吸收的剩余([8], pp. 148-155)。这些剩余之所以能够成为批判的立足点，在于它们并非从外部输入，而是资本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裂缝。

这样的裂缝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辨认。第一个是算法黑箱与可解释性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的运作依赖于用户对算法的信任，而信任的前提是算法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然而，深度神经网络的黑箱特征决定了其决策过程无法被完全追溯。用户面对推荐内容时的困惑，或对算法决策的质疑，每一次算法出错的体验，都是物化裂缝的显现。第二个是用户自主性与其被捕获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需要用户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来生产数据，但这种自主性一旦真正觉醒，便会追问数据的归属与劳动报酬的问题。数字资本不断激活用户的自主性，又不断试图驯化这种自主性，这一矛盾本身就孕育着反抗的可能性。第三个是不可数据化的残余。量化物化试图将一切数据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数据化，即不确定的情感、不可预测的判断和无法被标签化的经验。蓝江曾以剩余数据概念讨论过类似现象([9], p. 1)。不可数据化的残余侧重于指那些原则上无法被完全数据化的质性维度，比剩余数据更彻底地指向了数据化的边界本身。这些残余在数字资本的逻辑中没有位置，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构成了资本无法完全殖民化的空间。

上述三个裂缝分别指向认知层面、实践层面与存在层面，但三者共享同一种性质，即它们并非从外部输入，而是资本逻辑内部生长出来的溢出。内在批判的任务，在于不断指出这些溢出的存在，使原本被物化遮蔽的东西重新变得可见。当裂缝被指认、矛盾被命名、残余被看见，物化的自然性便开始松动。至于具体的制度方案，诸如数据公有、平台民主与算法透明等，应当在批判的进程中由实践者自行探索，理论工作的任务在于指出裂缝，而非规定蓝图。

5. 结语

在卢卡奇与福克斯的理论关系中，物化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逻辑。马克思的商品物化批判经过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推进，已经完成了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移。福克斯则将这一批判进一步延伸至数字技术与数据领域，使物化批判获得了回应数字资本主义的能力。但福克斯的理论方案本身也存在一个未能闭合的缺口，即主体如何意识到自身被控制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所揭示的核心困难。

福克斯对卢卡奇的继承与发展，在批判对象的扩展和控制机制的揭示上构成了有效的理论推进，但其实践方案因绕过了主体觉醒的前提条件而难以成立。物化批判若要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继续发挥批判效力，便不能停留于从外部输入某种正确意识或理想方案，而需要转向一种内在批判，即在资本自身的运作逻辑中识别其无法完全吸收的裂缝与剩余。算法黑箱与可解释性的张力、用户自主性与其被捕获的矛盾、不可数据化的残余，三者并非来自外部的批判标准，而是数字资本运作中必然产生的溢出。这

些溢出构成了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真实立足点。

物化批判的历史表明，批判对象的每一次扩展和方法论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回应。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调整仍在进行中。本文关于内在批判及其三个裂缝的讨论仍然是初步的，其方法论基础及其与批判理论传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澄清，但这或许正是物化批判在数字时代得以继续展开的空间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9.
- [2]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3] 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4] 蓝江. 从智能拜物教到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5): 15-23.
- [5] 周露平. 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与批判超越[J]. 哲学研究, 2021(8): 41-50.
- [6] 朱春艳, 刘嘉琪. 从卢卡奇到福克斯: 数字时代重思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意义[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4): 61-72.
- [7] 福克斯. 交往批判理论: 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M]. 王锦刚,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 [8] Adorno, T.W.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Continuum.
- [9] 蓝江. 从剩余价值、剩余快感到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辩证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 19-27.